

“不够朋友够英雄”

——黄炎培致刘质平

黄炎培和刘质平,都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当然黄炎培的知名度更为广泛,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创办学堂,鼓吹排满。辛亥革命后,又曾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并在全省创办多种师范学校以及农校、商校等,是中华职业学校的创始人。一九四九年之后,黄炎培打破了自己“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据说是经周恩来总理的说服而欣然从政。所以后来做了大官,历任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

相比之下,刘质平基本上布衣一生了。他早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著名全才艺术家李叔同的得意门生。后在李叔同先生的鼓励帮助下留学日本东京音乐学校,回国后长期从事音乐教学,与吴梦非、丰子恺共同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后又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等。五十年代后,在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任音乐主任和教授。最高的“官”大概是被选为山东省音协副主席了,可是没几年却被打成了“右派”,“文革”时又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被“彻底打倒”……直到一九八〇年刘质平先生被“彻底平反”时,他已经长眠于地下两年了。

虽然黄炎培与刘质平早年从事教育时相识,但他们的交接并不多。刘质平自日本回国后第一份教职是老师李叔同给介绍的城东女学,而这城东女学,也曾是黄炎培先生曾经任教的学校,只是黄、刘并不同时而已。然而,他们有一位共同的师友就是李叔同。李叔同早年在上海就认识了南洋同学,师从于蔡元培,那时黄炎培就是他的同窗好友,同学中还有邵力子、谢无量等。晚年时黄炎培也曾写过一篇《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的文章,记述了老同学,尤其是他写了李叔同出家后,其日籍夫人寻到了杭州,与法师见了最后一面的情景,绘声绘色,似幻似真。告别时他写道:“船开了行,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浆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一不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这一段往事仅黄炎培一人说过,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城东女学的校长,也是叔同的好友杨白民。可是其他几位当事人都未见记述,黄炎培的这段回忆史料则姑且为真了。

而刘质平,自从浙江一师遇上了李叔同老师以后,我们都知,先是李叔同培养、资助刘质平留学,后因李叔同出家成了弘一法师,刘质平又回过来一生供养老师,因此他俩是“谊为师生,情同父子”,乃成为我们良好师生关系的最典范。也许就是有这么一层关系,才会有九四九年刘质平给黄炎培的一封信,而以下则是黄的一封回信。很有可能,这也是他俩仅有的一次通信。

质平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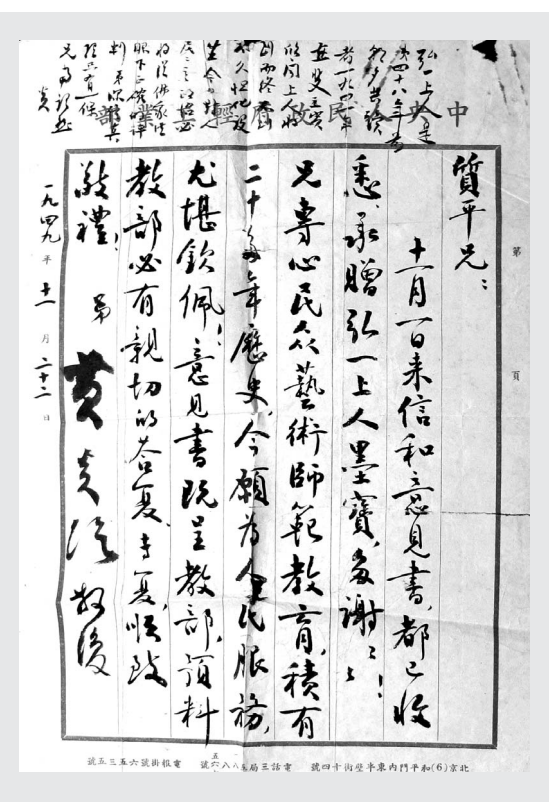
十一月一日来信和意见书都已收悉,承赠弘一上人墨宝,多谢多谢!兄专心民众艺术师范教育,积有二十多年历史,今愿为人民服务,尤堪钦佩。意见书既呈教部,预料教部必有亲切的答复,专复。顺致

敬礼!

弟黄炎培敬复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弘一上人我是第四十八年前朝夕共读者。一九四一年在斐立宾灾闻上人得到,而终未到来,不久化。设定,今日对人民民主政治必将从佛法眼下定正确的评判。弟深信真理只有一条,兄当谓(欣)然。炎。

这一封黄炎培致刘质平的覆函,原件现藏于浙江平湖李叔同纪念馆,捐赠者即刘质平的长子刘雪阳先生。前些年我随八十三高龄的刘雪老去纪念馆,因当时我正在编注《李叔同致刘质平书信集》一书,蒙特许,还让我戴了口罩手套,进了恒温库房,一睹先贤手泽,亲近过眼了数件珍贵的弘一法师书画以及这一封黄炎培手札原件。现存的信封原件上邮票已被挖剪,此因刘质平珍藏的一批原信曾于“文革”时被抄走,待发还时已“满目疮痍”,残损



黄炎培致刘质平信札原件(部分)

不齐矣,擅自“挖剪”之举系“造反派”中一集邮爱好者所为,刘质平看了十分痛惜!但当时是一九七三年,一大批弘一书信墨宝能劫后余生获得返还,已属万中大幸,谁还敢再有半点不满之言?

黄炎培此信旁记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而实际信封上的收信邮戳却是“50.2.25”,可能信写好后来办交办公室秘书登记、抄录再存档,待寄出时又过了二三月。说起这信的缘由,据刘雪老的介绍,可能是父亲刘质平写信求黄炎培先生介绍工作一事,黄给予的回信。

刘质平当时在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任教授和教务长,校长唐学咏曾是他的学生。说起这位学生,刘质平与之关系也非常好。当年唐学咏将去法国留学,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刘质平则关照他去上海某家店量身定制一套西装,费用不必担心,由刘质平去付账。这种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资助学生的风范,也是秉承李叔同先生特点,刘质平始终向往并恪守着先生的道德精神,时时以先生的教导为人处世。当唐学咏回国后先后创办杭州音乐馆附设音乐院和福建音乐专时,皆须请有影响的老师来任职,刘质平总是辞却其他学校的邀请,率先接受唐学咏之请而担任要职,给学生以最大的支持。

四九年新政权建立后,作为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心理上自然有一种恐慌和顾虑。当时的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属旧政权的“遗留产物”,即将面临解散。此时此刻,刘质平怀着一颗忐忑之心,写信给先师的同窗好友,也是从事教育出身的黄炎培先生“求助”,应该不算是过于唐突的。作为教育界的元老应该知道,刘质平在音乐教学上的作用和地位,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刘质平创办了多所音乐专科学校,并在全国各地数十所师范学校从事音乐教学工作,编写出版了多种音乐教学的纲要与课本,如二三十年代的《钢琴教本》、《开明音乐教程》一、二册等,还有《小学歌曲教材集》《中学歌曲教材集》《实用和声教材》等书,是我国早期音乐师范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但从黄炎培的回信中并未看到实质性问题的答复,只是说“意见书既呈教部,预料教部必有亲切的答复”云云。

信中我们还看到,刘质平为了表示诚意,还寄赠了一幅先师的墨宝给黄炎培留念。弘一法师的书迹,无论是对联条幅还是尺牍便条,在今天已是高不可攀的天价了,动辄数千万已是寻常。前几年一幅横额行楷书“放下”两字,在西泠印社一场秋拍中,经过五十轮的竞价,最终就以四百七十多万成交。可是在当时,大师的墨宝虽也珍贵,但却不是以金钱来衡量。刘质平作为弘一法师最亲近的

弟子,是收藏和保存大师墨宝手迹最多的人。以前弘一法师每每要印佛经弘法或办其他事,总是抄一些格言警句,让弟子去化缘。而刘质平总是将先生的墨迹一一珍藏,然后以自己的薪资或兼课所得列出部分来供养先生,从不轻易将先生的墨迹散去。待弘一大师圆寂后,刘质平手中有大师遗墨一千多件。即使抗战时期颠沛流离,生活困苦,刘质平在逃难中也是极力保护好大师的墨宝,视墨宝胜过自己的生命。抗战胜利后,孔祥熙曾愿以五百两黄金的高价,收购其珍藏的弘一法师十六条屏《佛说阿弥陀佛经》,但刘质平依然不为所动,婉言谢绝。如今这十六幅楷书佛经和百余通弘一法师的书信,亦由刘雪阳老根据父亲的遗愿,一并无偿捐赠于平湖李叔同纪念馆,供世人瞻仰观赏。

虽然刘质平从不愿以先师的墨宝卖钱,但他赠送朋友倒也是常有之事。刘质平晚年寄寓沪上长子刘雪阳之家,三代挤于一室,住房局促不堪容膝。有一位山东的学生看了实在不忍,即以公家的名义,向上海刘质平所居住的房管所发函。打申请报告,呼吁为刘质平教授改善住房条件。不料此招还真管用,后终于分得一套住房,缓解了刘家居住之苦。为了答谢这位学生的好意,刘质平无以为谢,于是挑了四幅弘一法师的格言真迹赠他。说起来很有意思,前些年这位学生年事已高,为了解决子女的住房问题,将四幅弘一法师的墨宝拿出拍卖,获得四百余万,亦遂了心愿皆大欢喜。

再说黄炎培的书信和他的书法。黄炎培出生在上海川沙镇的民居“内史第”沈宅,其时还属于江苏省。说起这“内史第”沈宅,可是大大的有名。原为清咸丰九年举人、内閣中书沈树鏞的住宅。沈树鏞是一位博学多才、能诗善画的学问鉴赏家,又是一位古籍、书画、金石碑帖的大收藏家,其最珍贵即是汉代熹平石经宋拓残片,上有翁方纲、毕沅、孙澍如、王念孙等众多名家题跋。沈树鏞于是便在“内史第”内宅楼上专辟一室,名曰“汉石经室”。而黄炎培的童年及青少年读书时期,基本都在“内史第”的书房汉石经室度过。因为黄家与沈家有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黄炎培祖父是沈树鏞的故事,而沈树鏞之子沈肖韵又是黄炎培的姑父,关系非常的亲近。黄家四代都居此,“汉石经室”的大量碑帖,典藏古籍以及近代中外名著,为黄炎培的青少年时临帖读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晚年黄炎培曾写过一本自述体的回忆录《八十年杂忆》,书中追忆了他少年时代在内史第的汉石经室读书情景,还有就是沈肖韵对他人生和学习有着至关重要的帮助。黄炎培考过秀才,中过举人,可见他的旧学功底、八股文章以及书法功力都非常的深厚,我们看他的字,用墨丰满,纵横自如,他的书法是从颜字入手,虽然其楷书也带有一点馆阁体的风骨,但行书尺牍体却略有变化,巧拙相济,写得雍容雅逸而不俗。书学颜体的名家如翁同龢、谭延闿等,皆雍容有度,宽博大气,这一点黄炎培虽难比翁、谭,但在这一辈文人中,其书法还是很有可观的。

黄炎培的故乡浦东新区地方志曾编过一册《黄炎培往来书信选辑》,其中也收集了这封给刘质平的信,当然作为新中国的高官,黄炎培更多的是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还往信函,许多皆商量国是、讨论政策的重要文字。众所周知,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情非同一般,坊间传闻最多的就是毛泽东向黄炎培借观王羲之珍迹秘本的故事。说是毛泽东听说黄戴有王羲之的秘本,就提出借阅,言明借期一个月。但借后不到一个月,黄炎培怕夜长梦多,就三番五次地打电话通过警卫员催问:主席看好了没有?

毛主席被问得大为不悦:“不是讲好一个月吗?到期不还,我失信,得不到一个月借付,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后一个月到期,毛主席让警卫员将珍帖完璧归还了他。待一个月期满,毛泽东让人把秘本小心用木板夹好送回,并对黄的提前“催付”之举评价为:“不够朋友够英雄。”

看了毛主席的这句评语,我再反复阅读黄炎培回刘质平的那封书信,基本也属未对刘的问题作正面回答,而是虚与委蛇地玩“太极”。这是不是也算“不够朋友”的表现呢?

在“江南风——当代书画名家作品联展”上,战斗英雄、原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韩德彩中将军的发言,让笔者思索良久。主持人在介绍时说,出席开幕式的有将军书法家韩德彩先生……后来将军上台讲话,专门就主持人的介绍发表了一番感言,赢得与会者一片掌声。他说:我不是什么书法家。就是在偶然的时候喜欢了写字。我也不是什么先生。先生是那些有大学文的人,我就是同志,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将军的话不多,但非常朴实、直率,值得深思,在此,笔者为将军点赞!

杭州市委宣传部、西泠印社等单位策划主办“喜迎 G20 西泠印社文化艺术系列活动”,其思想是以艺术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浙江故事和杭州故事,让各国宾客领略到中国文化与艺术的魅力。在系列活动中,笔者以为“手札书法展”最有创意,作者为书法篆刻家,还有当代文化界、美术界、史学界、影视界、政商界等百位名流人士,他们从各自的文化视角有感而发,表达思想,书写感悟。手札从古至今是文人较为喜好且思想表达的一种纯粹形式,无拘无束,情趣自然,充满诗性精神,这也是当下书法创作需要和修炼的一种文人气质与生命形象。

现在比较流行“微信投票”,据说,这也是什么“+”,一是可以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广纳民意;二是体现“三公”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是否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可能就很难说了。前几天,在微信圈里,就遇到朋友“拉票”,帮邻居的孩子评“好儿童”投一票;还有位朋友为了让自己的学生评上“小小书法家”也不断给微友私信,请都投上一票等。这样投票有用吗?真实性如何?值得商榷!据说,现在市场上还出现了“刷票”公司,可帮助那些“好胜者”,呵呵!“微信投票”一旦掺杂了“人情票”、“拉票圈”,可能就完全失去了它的初衷,“网络投票”也应加强监管。

近来,媒体用了不少篇幅宣传“工匠精神”,与此,也引发一些艺术家们的思考,就连微信中的“潜水”也开始冒泡了。对“工匠精神”的理解,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但其内涵中的“专注”与“敬业”是达成共识的,这也许就是倡导之价值观所在。多年来,书法界也在鼓励“独具匠心”,但在创作中,可能强调“独具”多一些,“匠心”不够。不过,“匠”字是一个中性词,使之人的观察也往往依据其过程与成果去判断褒与贬,模糊了“匠心”与“匠气”的界别。“工匠精神”作为一种精神传承是必要的,但这种精神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一种对艺术的执着与创新。

5月23日是第三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不少地方组织了艺术家深入基层、深入农村开展文艺扶贫志愿服务活动,赢得了基层群众的欢迎。不过,文艺扶贫与其它扶贫应该不同,那种“摆个摊”、“转一圈”、“演一场”很难解决好基层的“诉求”,更不可能解决“贫”的问题,文艺人才的培养需要有一个过程。有人提出“文艺也要精准扶贫”,笔者以为这个想法值得推广!认识和把握了文艺人才培养的规律和特殊性。扶贫需要因地制宜,有基础的地方怎么扶贫?没有基础条件的地方又怎样去扶贫?这是有关部门需要认真考虑和规划的,扶贫要精准,要持久,更要见成效。

6月9日,市书协举办了一次上海市中国书协会员书法篆刻作品展,据悉,像这样“规格”的展览可能尚属首次。在开幕式上,周志高主席在正视上海书协会员现状的情况下,直言“不容乐观”!观其展,的确也听到不少观众的议论,觉得有的作品有待提高,“国字号”的艺术水准好像没有体现出来。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由于时间仓促,有的作者可能来不及认真创作;二是可能有的作者没有充分发挥出自己已有的“专长”进行展示。因此,让一些观众感到“不解渴”,这也说明广大观众对“国字号”的会员有一种期望、一种期盼!

“书印参同”是《中国篆刻网》策划的一项展事活动。所谓“参同”就是每位作者将自己创作的篆刻篆书一同参展,缺一不可,这对作者来说要求更高了,作者须在篆刻篆书两方面都应达到评审的标准。有专家说,展览是一次创举,一次有益尝试。展览也告诉,篆刻家应书印俱佳,“书印合一”方是修炼的目标与成功路径。“印从书出,书从印入”是硬道理,也是衡量一位成功篆刻家的艺术标准。此次展觉得到了中国篆刻艺术院、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和篆刻委员会的支持。活动现已接近尾声,但在书法篆刻界所产生的影响非小,或许它将成为未来中国书协篆刻展的一个方向,参同传统,参同经典,参同创新。

海派书家掀谭(二)——汪洵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汪洵可能是一个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名字;对于许多书法爱好者来说,汪洵也许同样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但只要我一说,他是清末民初“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的首任会长(1909年),而大名鼎鼎的吴昌硕仅是个副会长,直到1915年汪洵去世后吴昌硕才继任了该会会长,您就该马上对他刮目相看了吧。可是,颇具权威性的《上海美术志》都未能收录他。笔者不禁为汪洵而感叹:晚清之名款?海上之名款?

“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是沪上第一个民间集书画篆刻创作、鉴赏和经营于一体的社团,由盛宣怀出资建立。该会对海上书画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盛怀宣是晚清沪上著名的实业家,其收藏了许多金石书画珍品,并准备建立一个艺术馆,供民众鉴赏,其中的许多藏品都是由汪洵从民间收购的。所谓“题襟馆”,即为文人雅士诗唱和、抒写胸怀之场所,清代钱谦益有“肝肠迸裂题襟友,血泪模糊织锦妻”之诗句。“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当时在书画界是个什么重量级的组织,我们只要看看当时的会员名单就知道了:李瑞清、哈少甫、王一亭、丁辅之、赵云壑、吴待秋、赵叔孺、钱瘦铁、李书平、黄宾虹等名家大家都是其会员。汪洵靠自己的名望吸引和聚集了沪上的诸多书画名家。每天晚上“题襟馆”里都是高朋满座,济济一堂。一张大型的长方书画桌周围,总是挤满了人,有作画题诗的,有评品议论的,有相互交谈艺术创作心得体会的,一直接到接近深夜,人们才告离去。除了对艺术创作的交流探

讨,题襟馆的会员,还常将收藏的珍贵书画印章拿到馆里陈列,彼此观摩研究。有时为鉴别一方古印、一幅古画或古字迹的真伪,彼此争论不休,各抒己见,学术争鸣气氛热烈。书画掇客几乎每晚拿许多书画金石古玩到馆里兜售,题襟馆也替会员经办书画金石作品的销售事宜。外地来上海以卖字、画、印为生的职业艺术家,一般也通过题襟馆得以代订润格和介绍书画金石的销售。遥想当年,汪洵该是多么的风光啊!用现在的话说,当时的汪洵无疑应该是一个大腕级的人物。后来“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的影响已超出了上海地区,远在杭州的西泠印社都聘有“题襟馆”的一席之地,又名“隐闲楼”,它是吴昌硕、王一亭等人于1914年筹集书画易资而兴建的,形制为典型的江南园林建筑样式,它至今仍静静地矗立在西泠印社中,诉说着海上画坛那些奇闻轶事。吴昌硕无疑是近代书法史上的一座高峰,但在清末民初的海上书坛,汪洵与吴昌硕、张祖翼、高邕被公认为海上四大书法家。当时上海主要街道的许多店家招牌均出自汪洵之手,许多人都以得到汪洵只字片纸而引为荣,其声誉盛隆可见一斑。

在“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成立前,汪洵已在沪鬻书十余年。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翰林是颇受人尊敬的。或许是由于他的翰林身份,汪洵的书法自然也是很受欢迎的。翰林编修是为皇帝起草文件之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皇帝身边人,这样的位子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今都是炙手可热的,但汪洵却并不热衷于此。汪洵(1846—1915),初名学

翰,字子渊,一字渊若。江苏常州人。沪上名媛陆小曼祖籍常州,其父入职就是有汪洵举荐的。汪洵工诗能文。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可他并不愿意在翰林任职,不到两年,即1894年,48岁时便辞去翰林编修之职到上海鬻书,从此寓沪二十余年。这其中的原因或许是上海开埠后的书画市场环境,加之汪洵出生于江苏常州,那里自明代其就有极其繁荣的书画市场,这都可能促使汪洵弃官从艺。但更为重要的可能是与晚清时期的反清思潮有关。清廷压迫汉族的种种罪行,以及康乾两朝众多的文字狱,推翻清王朝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意识日积月累,影响到许多汉族士人的职业选择。许多有志之士不再愿意为清廷效力。汪洵也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毅然选择了辞官寓沪,卖字为生的道路。从此开始了他的沪上鬻书之生涯。

汪洵的书法行、楷、篆、隶各体皆擅,但尤以真书和篆书为主。《海上墨林》载其“行楷真书,间架峻整,苍劲挺拔,兼精篆隶,规模秦汉,浑厚为工”。书法颇真爽,得其神骨,又参以他帖而变化之,工力甚深。其楷书工整平稳,结构搭配匀称端庄,线条含蓄而厚重,特别适合店招牌字,因此当时许多商家请他题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想必润例也不会很低的。汪洵的行书从真书化出,与真书相得益彰,其行楷书无论是书法还是结体都具有明显的颜真卿的影子。众所周知,颜体书法结构方正茂密,笔画横轻竖重,笔力浑厚,挺拔开阔雄劲,但略显缺少变化和特点。与行楷书相比,汪洵的篆隶书

体则更显其特色,尤工小篆,古朴浑厚,其用笔亦圆浑厚重,从容不迫,结体参金文,凸显古穆丰腴。由于晚清是碑帖共存,但仍以扬碑抑帖为主,尤其是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在邓石如书法实践的基础上大肆鼓吹尊碑之书风。汪洵的书法自然不能不受到此风气的影响。但汪洵对碑版书法的理解和吸收不够深入,加之他本人擅长金石考据和文玩鉴赏,正因如此,使他的篆书创作最终还是纳入到金石考据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理性书写的轨道,其书法的创作受到制约,最终没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来。

汪洵也善丹青,工花卉草虫,秀逸可爱,惟不轻动笔,鲜有知其能画者。但他自言“绘画优于金石,金石优于书法”。汪洵少时还喜刻印,非旧友不知,其所用印皆自作。汪洵是一位集诗文书法、篆刻以及鉴赏于一身的全才。尤其是他的楹联创作与书法艺术的结合上造诣极高。可以说,汪洵是一位学问和名气均杰出的书法名家。

放眼当今,人们已几乎将汪洵遗忘,史学家已不太提到他了,或许只有收藏家还在关注他。这实在是一个遗憾。究其原因或许与他的书法过于工稳,缺少新意和变化有关,也可能与他受科举制度的熏染有关,这是当时学子们求仕的必然途径。尽管他在沪鬻书的过程中,其书风也受到社会风气及碑学书法的影响,但还是没有摆脱陈规相袭的老路,在吸收碑学营养方面起色不大。这种书学的局限以及艺术观念的革新不足,最终导致书法成就难以在书法史上成为高峰,无法与吴昌硕相媲美。看来,处理好进入传统与走出传统不仅是当代书法家的面临的重要课题,清末民初的书法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尽管如此,但汪洵的艺术造诣是不应被忽视的,尤其是在海派书法的语境下,汪洵在海派书法的演化和发展过程中毕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也不该忘记。

85. 剽窃文章者不若市井窃贼

吾身微,但陋文亦受过剽窃。今剽窃文章者远胜于古,据传闻康有为、刘海棠亦曾有剽窃之陋行,真实与否此处不论。市井之贼以盗窃为糊口谋生,窃人物质财富;高雅之文人为名誉、为升迁,窃人精神财富。市井之贼,人人喊打,虽偷偷却在明处,随时有被抓、被打之虞,乃高风险职业;高雅文人,人人尊敬,虽偷偷却在暗处,无棍棒之痛,无提心之虑,乃舒适之职业。然窃贼易识,文贼难认。窃贼文化教养不高,偷盗脏物,斯通见惯;文化窃贼饱读诗书,满口仁义,却专替此下流之事,真不若市井小人也。

86. 谨遵师命者艺退

河北老书家陶然,其师名曰张布舟,在陶然已写十余年楷书之时告诫之:“到你二十五岁之前要老老实实地写楷书。”陶当时四十二岁,到四十五岁还要写二十三年,前后将近四十十年楷书,初闻之惊愕半晌。至今陶然擅用长锋羊毫和鸡毫作书,主打书体楷书极为僵化,始知有时谨遵师命者艺难精进;因学书之路,适合于恩师而未必适合于己。他人之言必经我之头脑过滤乃付诸行动。否则,对恩师极为崇敬之下必然是崇敬下的僵死苦功。而长期斯磨于一技,一体则头脑极易僵化,思维钝退,艺之精进难矣!

不夜斋臆语(二十三)